

湖南农民考察报告读后感(优秀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湖南农民考察报告读后感篇一

最近，有一个调查研究的工作任务要做。为此，我又重新查阅了毛泽东同志于1927年3月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份报告在中学时期便被老师推荐为调查报告的范本，今日读来依然风采不减。《报告》很长，但是逻辑清晰、亲切自然、说服力强。读完后有了一定的收获：一是调研主题如何确定。笼统地说，调研要围绕你感兴趣的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来确定。

具体一点，就是。需要说明的是，有的时候调研的主题不一定只有一个，但是我们要根据矛盾的关联性，清晰地排出调研主题的主次顺序来。对于我们来说，虽然调研主题似乎领导已经确定，但是在具体调研的环节，还是要尽量突出一个主题，旁及其问题的。调研主题确定了，就要围绕调研内容作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包括查阅相关的资料，调研活动具体的组织方案的拟定及抽调合适的人选等。二是采取什么样的调研方法。

社会调研的方法有很多，基本分为两类：一类是非现场调研。包括查阅资料、数据分析、软件模拟、电话抽样访谈等。另一类是现场调研。如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察看、服务对象走访等。采取什么样的调研方法取决于你的调研相对方和调研主题，总的原则就是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取最真

实有效的信息。当然，信息的真实有效性往往需要事后的评估确定，所以，调研的经验在这里便具有特殊的价值。1927年3月，毛泽东同志回到湖南老家，为了了解中国革命农民运动的阶段性情形，选取了有代表意义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县进行了32天的实地考察，主要采取“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的方法，再与自己以往的革命经验相比较分析，指出了在今后的革命道路中，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一样都是可以依靠的革命重要力量，最后得出中国共产党应当顺应历史潮流站出来领导他们的结论。

三是分析问题的方法。如时间序列分析、比较分析、统计分析、系统分析、个案分析等等。

四是如何撰写调研报告。调研报告的写法是一个仁者见仁的问题。有的欣赏八股式的调研报告，现状、问题、分析、建议或结论逐一展开；有的习惯观点对比式的调研报告，通过的一定的情形下比较两种甚至几种观点的效果，结论立现；有的擅长案例分析式的调研报告，解剖麻雀，小中见大，偏中概全，建议往往很有针对性；有的追求反证式的调研报告，开篇提一个相反的论点，通过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层层反驳得以立论。毛泽东同志的这篇调研报告范文，既有观点对比，又有案例分析，还有逻辑归纳，在我看来是一篇比较综合的写法，说实话不易模仿，但是我们从中学到的东西也足以借鉴应用了。

湖南农民考察报告读后感篇二

这份报告写于1927年3月，通过实地考察，毛泽东提出要重视农民问题，也提出农民力量是革命的根本力量。在重视的基础上要把这个庞大的群体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干什么呢？组织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等一切阻碍农民运动的阶层。

详细分析和说明了农民运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具体做的事情，重点肯定了农会做的十四件事：

- 1、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
- 2、政治上打击地主
- 3、经济上打击地主
- 4、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打倒都团
- 5、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 6、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
- 7、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
- 8、普及政治宣传
- 9、农民禁赌
- 10、清匪
- 11、废苛捐
- 12、文化运动
- 13、合作社运动
- 14、修道路，修塘坝

从字里行间都透露出毛泽东对权力的绝对控制和对一切异己势力的零容忍，同时这些事件，在30年后的1957年逐一上演，一直持续到1977年。什么叫革命，革命是要流血牺牲，你死

我活的，不管是武力的，还是文化的。就像毛泽东报告中所说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从一开始，毛泽东就很清楚具体要怎样革命，他想要的就是一切都要打倒推翻，在按照自己的想法重建。分析深刻，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大的方向把握住了，其他的无非就是边走边补充。1927年的报告已经奠定了他此后50年的方向和施政方案，不由得让我想起一句话：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

都说“命有高低，运皆平等”，所谓大格局之人，必定大起大落；而普通格局的人，则会一生平稳。或许是吧，毛泽东的一生转战南北，从多次被排挤，到重掌权力，有他的性格和格局决定，也由他的能力所决定。在1927年那样一个时期，他能说出：“很奇怪，南昌方面传来消息，说蒋介石、张静江诸位先生的意见，颇不以湖南农民的举动为然。湖南的右派领袖刘岳峙之辈，与蒋、张诸公一个意见，都说：“这简直赤化了！我想，这一点子赤化若没有时，还成个什么革命革命！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

这在当时可不是简单的意见不同，而是在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时期的对骂，不得不说毛泽东真正是中国最有成就的“愤青”，在一定程度上，中国需要愤青，需要这种对很多不好现象的“破口大骂”，在毛泽东的骨子里，除了对中国古代的一些诗词歌赋很赞赏以外，对传统文化的成见很深，其实也是的，包括我自己，很多人也说我是愤青，对很多事情看不惯，而我们的老师或是长辈经常教导我们：见怪不怪！不是和我们一道去解决问题，反而劝说晚辈，忍一忍就好了，正是这种对忍让文化深入骨髓的沉淀，造就了我们保守的一面，造就了我们羊性文化的精神，造就了我们容易得过且过。

正是忍，让我们忍到国土沦丧，正是忍，让我们喜欢稳定。慢慢才发现，忍这个字的力量太强大了，正是这个忍字让中国皇权的封建制度经历千年，也让人民被压迫千年。每一位统治者，都会利用这个字来教化人民，你要学会忍，于是乎，我们忍，逆来顺受，一直忍着被统治者统治！

我们呼唤正义，呼唤公平，却一直忍着，哪里来的公平正义？

难怪毛泽东评价鲁迅为中国人的灵魂，“沉默哦，沉默哦，不再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结果，一时都忍了，还在乎另一时吗？继续忍着吧！在悬崖边上，退一步就永远没机会进一步了！

湖南农民考察报告读后感篇三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一篇长达30页，内容多，写读后感如文字过少容易失之笼统，故而只针对“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一语写点感想。

农民是中国革命最主要的同盟军，为了迁就国民党而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毛泽东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历时三十二天，在湖南步行了七百公里，做了详尽的考察工作后写下此文。

“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说法，其实是要回答当时的湖南农民运动是否“过分”的问题，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的问题。

中层以上社会、国民党右派认为革命“糟得很”；中派则认为农会“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所以是“过分”的、是“矫枉过正”的、“未免太不成话”。而毛泽东通过深入调查后，认为这些观点都是错的，

农民革命“好得很”呢！他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

他的依据主要有两条：

一是，一些所谓“过分”的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

二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之所以说出“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是由于农民运动已被一些反对者定性为“矫枉过正”，他是为了与这种观点针锋相对，是为了驳斥这种错误评价而将“矫枉过正”的成语予以改写，因此，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从根子上就认为：要矫枉，就必须用过正的方式来办，才是对的。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毛泽东的“矫枉必须过正论”，就能解释，为何毛泽东（虽不是同一时期）但其实是同意“过犹不及”的思想方法的。毛泽东在1939年致张闻天的信中，肯定了过犹不及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并从质和量的统一来说明了过犹不及的合理性。

湖南农民考察报告读后感篇四

1927年3月5日，毛泽东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这是针对当时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批评而写的。竣工于武昌都府地41号。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 欢迎品鉴！

因为工作关系，当年经瞿秋白推荐到中宣部工作的已故老人羊牧之的女儿羊苹，曾多次向笔者讲述其父亲当年所回忆的，

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许多往事，听来颇为感动，特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1922年2月，瞿秋白在莫斯科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3年1月25日，瞿秋白在苏联生活、工作已近两个年头。鉴于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他同赴苏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陈独秀一起回到了北京。1923年6月中旬，瞿秋白赴广州参加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他主持起草了党章、党纲草案，并向大会作了报告。1923年6月15日，瞿秋白担任了刚创刊的中共中央理论性刊物《新青年》（季刊）的主编，同时又参与党的理论刊物《向导》和《前锋》的编辑工作。同时还为《民国日报》、《东方杂志》等期刊撰写文章。1923年7月，瞿秋白受中央派遣，前往国共合作期间创办的由于右任担任校长、邵力子为副校长的上海大学，主持教务工作，并经李大钊推荐兼任了该校的社会学系主任。丁玲在回忆中说：“瞿秋白给我们上课，讲的面很宽，既讲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不但讲死人，也讲活人。瞿秋白是最好的教员。”

1924年1月24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瞿秋白参与修改了主要有孙中山提出的“联苏、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核心内容的大会宣言。1925年1月，在中共中央于上海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瞿秋白作了长篇发言。他明确提出并阐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会后他与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等组成了中央局，领导全党工作。同年“五卅”运动后，他又担任了中共中央出版的《热血日报》主编和主要撰稿人。这份报纸共出了24期，瞿秋白平均为每期报纸撰写了两篇文章。

1925年7月，正在上海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瞿秋白，与已是10年未见的好友羊牧之重逢。经瞿秋白的推荐，羊牧之于1926年的夏季来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从事文件的校阅和一些杂差。瞿秋白对羊牧之说：“在中宣部工作，要注意和重视思想战线上的动向，对各种反动的思想，要给予坚决地

打击；而打击的唯一方法是通过说理，不能靠漫骂的办法，因为漫骂是一种无能表现。”他还幽默地说：“你看有几个泼妇骂街的骂赢了的？”一次彭述之要羊牧之将《近阶段宣传要点》送给瞿秋白。在羊牧之的记忆中，此时瞿秋白的肺病发作得很厉害，身体消瘦，脸色苍白，医生要他卧床休息，但他仍然坚持工作。他郑重交待羊牧之说：“这个要点还要征求基层同志的意见。”接着又说：“宣传要点，关键是在‘要’字上；基层的同志在一线，他们最有发言权。”瞿秋白说到这里，停顿一下后，指着书架上的《水浒》风趣而严肃地说：“鲁智深三拳解决了镇关西，可见这三拳都打在了要点上。”

正在瞿秋白谈及其对《近阶段宣传要点》的意见时，交通员送来一个文件，他阅看后兴奋地说：“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现在北伐战争已经打响，周恩来、林伯渠、李富春、叶挺等一大批我党卓越的军事干部，都在北伐战争中担任了主要骨干，看来革命形势将会出现突破。”说着，他拿起了《近阶段宣传要点》对羊牧之加重了语气说：“宣传要点里要增加宣传北伐战争伟大意义的内容，要宣传北伐战争取得的一个个胜利，进一步做好唤起工农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拥护我党立场的人士，使他们支持北伐、参加北伐，争取北伐战争的全面胜利。”

羊牧之曾回忆说，瞿秋白一直提醒他，在与国民党的合作问题上，要持慎重的态度，既要注意合作，但也不能抱有幻想。他在介绍1926年1月于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情况时说：“在这次会议上，坚决贯彻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民党的右派受到了斥责，制裁了西山会议派；但是，以戴季陶为代表的反动思潮，仍然是一种潜伏的最大危险，一定要在理论上揭穿它的反动本质。”他接着说：“会议期间，我和毛泽东等代表正在楼上一起交谈，这时戴季陶等几个国民党顽固派人物也上了楼。毛泽东礼节性地与他们一一握手。可在与戴季陶握手时，毛泽东对他说：‘在台上握了手，不能在台下踢脚啊！’戴季陶听后，

呈现出了尴尬的神情。”据羊牧之回忆，瞿秋白在1925年冬季至1926年的一、二月间，先后撰写的文章有20余篇。其中在《向导》周报社于1925年8月出版的《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和1925年9月11日出版的《向导》第129期上刊登的《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以及1926年1月发表在《新青年》(月刊)第3号上的《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等重要论文中，他在迎头痛击戴季陶之流的荒谬言论的同时，准确全面地阐明了他自己关于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

据羊牧之生前的回忆，在一次晚饭后，瞿秋白神情严肃地对他说：“蒋介石在上海悍然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这是他看到了我们党的右倾软弱的致命伤，所以他才敢于这样做。”他停顿了一会接着又说：“我们真的太幼稚了，这一着棋输给了蒋介石；血的教训，真是太深刻了，我们对不起牺牲的同志。”由于讲得过于激动，引起他肺部的隐痛。他随手抚摸着胸口，稍停一歇后继续说：“我作为党中央的常委，也是有责任的。我深感在第一线的斗争经验太少，单靠读了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是干不好革命的。”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武昌第一小学礼堂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羊牧之作为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参加了这次大会，站在主席台对面的看楼上。这次出席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都想通过陈独秀的工作报告，进一步认识当时严峻的形势，提出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也很想听听陈独秀在会上做出的自我批评。但使大家失望的是，陈独秀依然坚持他的反对土地革命、反对武装农民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叶挺听了就问羊牧之：“他的报告经中央集体讨论过没有？”羊牧之回答说：“不知道，但这应该是讨论的。”这时一位四川口音的代表对另一位代表说：“不管他(陈独秀)怎么讲，格老子还是像以前那样干，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为使瞿秋白了解代表对陈独秀工作报告的强烈不满情绪，羊牧之就走到主席台后面的休息室，向瞿秋白汇报了叶挺等代表的反映。瞿秋白听后默不做声，神色凝重，

只是一口一口地抽着烟。

就在这次代表大会第二天的下午会议上，每位代表的座位上都显赫的放着一本署名瞿秋白的《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扉页上的副标题为《第三国际还是第0国际？——中国革命史中之孟塞维克主义》。这篇文章在系统地阐述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前途、动力、领导权、统一战线等根本问题的同时，对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右倾错误理论进行了尖锐地批判。陈独秀看到了这本小册子，表示大为不满。陈独秀的追随者彭述之则坚决支持陈独秀。他拍拍小册子说：“这是见了鬼？”而绝大多数代表看到了这本小册子，边阅读边交谈，情绪一时间活跃了起来。恽代英对坐在一旁的杨之华说：“这篇文章写得好，写得尖锐！文章中对谁革谁的命？谁能领导革命？如何去争取领导权？这些问题问得实在是好！”会上，蔡和森、恽代英、任弼时等代表，他们在阅读瞿秋白的文章后，纷纷站立了起来，激愤地批判陈独秀和彭述之等人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就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土地改革和建立人民政权两大政治任务，并讨论通过了关于没收大中地主土地、发展工人运动等问题决议。瞿秋白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议结束后的6月3日，瞿秋白被补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明确主管中宣部工作。这年的7月，瞿秋白已事实上接替陈独秀担负起中央的领导工作。羊牧之看着工作更加繁忙而身体日益衰弱的瞿秋白感到很心痛，于是经常上机关二楼去看望住宿、工作在这里的瞿秋白。这位同乡老友带着淡淡的笑意说：“现在是形势紧迫啊，我已经跨上了战马，除非中弹倒在枪口下，能不向前猛冲吗？”

1926年7月，北伐军势如破竹，不到半年时间，即打垮了吴佩孚、孙传芳的封建军阀的主力。当时形势大好的又一个标志是，农民运动如火如荼。

但在对时局的估计和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以及如何与国民党相处等方面，中共中央高层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瞿秋白与陈独秀和彭述之等人的观点相悖，争论异常激烈。瞿秋白这

时因肺病日趋严重，在党组织的催促和安排下，住进了医院的单人病房。谁知他一到医院，就要杨之华按照他开列的书目送书来，他说要乘机多读点书多写点文章。他边读书，边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思考着许多问题。他说：“我一天不做事，就会感到不舒服。”

在这期间，他撰写了20多篇文章。其中在有关中国革命与农民问题的文章中，明确论述了中国革命必须依靠农民的重要观点，认为没有农民的参加，就不可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1926年8月间，他又在广州，带病在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里演讲了《国民革命中的农民问题》。就在这篇演讲里，他提出了“必须要重视解决农民问题，解决他们的土地问题，这是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的观点。他还提出了耕地农有、武装农民、农民参加政权、剥夺买办地主阶级政权等方面的具体主张。瞿秋白的这些论述恰好与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示相吻合。斯大林在他对于中国无产阶级应该如何去领导中国革命使之能够取得胜利的指示中特别强调指出：“农民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共产党人如果不能把千百万的农民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并满足他们的土地要求而成为他们的领袖，革命事业就不可能胜利。”

羊牧之曾回忆说，瞿秋白于1927年3月中旬到达武汉，在了解了党内对待农民运动的分歧意见后郑重对他说：“目前，中央有些同志不敢支持已经开始或正在开始的农民革命斗争，反而横加指责，今天一个过火，明天一个越轨。毛泽东则不同，他针对我们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在1927年1月亲自到湖南农村，作了32天的实地调查，写出了针对性很强、很有说服力的调查报告。毛泽东在文章中痛斥了我们党内一切怀疑、否认农民运动的错误论调，大加赞赏农民运动，满腔热忱地给予支持。”瞿秋白显得异常气愤：“毛泽东的这份调查报告，在湖南省委机关周刊《战士》上首先刊登了部分章节，对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可是，在毛泽东将这份报告寄到中央后，陈独秀、彭述之却不准在《向导》周刊上全文发表。”

羊牧之生前清晰地记得，有一天的深夜里，他已经熟睡了。瞿秋白开会一回来就叫醒了他：“我已看过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调查报告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这是一篇好文章。”瞿秋白说后就交代他要单独刊印成小册子。羊牧之因当夜睡眠惺忪，一时未能弄清楚单独刊印的原由，出于是老乡熟人，他就去找住在楼上的瞿秋白，欲问个明白。谁知瞿秋白却问羊牧之有否看过这篇调查报告？还未来得及阅看的羊牧之脱口回答说：“只是翻了一下。”瞿秋白听了羊牧之的回答，显得很不满。他严肃地说：“这不行，我们部里的同志，对党内任何同志送来中央的报告文章，都要认真地研究，并提出自己的意见。”说着，他站起来：“只是翻了一下，我们旧衙门里的‘师爷’！”看到瞿秋白对自己的好友和部属这样严肃的批评，站在一旁的杨之华感到不服气。她接过瞿秋白的话头说：“牧之昨天翻了一下，今天可以再翻几下，你抓住人家一句话不放，我看啊，你才是摆出了旧衙门的官僚架子来了。”杨之华这一插话，使得3人不由得都笑了起来。

羊牧之说：“瞿秋白看到了党在陈独秀右倾错误路线的指导下，已经发展到非常危险的境况了，必须要及时纠正，所以他急着要赶印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羊牧之记得，瞿秋白为了使党内外的同志都能够重视这篇调查报告，他还特别在4月11日的深夜赶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言。”笔者找到的序言是这样写的：“‘匪徒、惰农、痞子……’这些都是反动的绅士谩骂农民协会的称号。但是，真正能解放中国的却正是这些‘匪徒、惰农、痞子……’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的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在这篇序言里，瞿秋白称毛泽东、彭湃为“农民运动的王！”

羊牧之在上世纪90年代还回忆说：“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瞿秋白所写的序言，在瞿秋白对我交办后，我

就郑重交给了一位熟悉党的出版机构武汉长江书局的负责同志，是这位负责同志去办理了赶排出版单行本的事宜。”出版后的单行本，其书名改为《湖南农民革命(一)》，一时间广为传播，影响很大。

《湖南运动考察报告》小册子印好不久，恰好杨之华从上海来到了武汉。谁知她刚见到瞿秋白，瞿秋白便从抽屉里拿出了几本书来，认真地对她说：“你要冷静下来，不要被革命高潮冲昏头脑。”说着，又特别拿起了《湖南农民革命(一)》这本小册子对杨之华说：“人人应该读几遍，这是一篇好文章，你必须读！你要好好研究这几本小册子，这算是我在武汉给你的见面礼。”

关于这本《湖南农民革命(一)》的小册子，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于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先后用俄文和英文发表了。当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全会上说，这篇调查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沈伟东）

1927年3月，毛泽东的经典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问世后，引起广泛关注。这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纲领性文献，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为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推动了农村大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90年过去了，再读《报告》，追溯《报告》形成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调查湖南农民运动不单是为了回应党内外对于农民运动的责难，还有其认识、实践、心理基础；毛泽东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农民作用的肯定、对农村建设的关注，仍不失其当代价值。

1927年3月，毛泽东的经典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先后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汉口《民国日报》的《中央副刊》、《湖南民报》刊发，引起广泛关注。4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单行本，

瞿秋白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说：“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5月、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俄文版和英文版先后转载《向导》周报刊发的《报告》。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评价《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3页）。在《报告》发表90周年之际，本文追溯《报告》形成的过程，对其历史作用和现实启示略作解读。

毛泽东青年时期就开始接触社会、了解社会。1920年3月，毛泽东在致周世钊的信中指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施的调查，及研究。”（《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页）在这里，毛泽东把调查研究、通晓国情作为改造中国的起点。

1925年2月，经中共中央同意，毛泽东回韶山养病。于是他利用这一机会在韶山进行社会调查。经过同各类人士接触、交谈，了解了韶山附近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农民的阶级状况和各种社会情况。1926年5月，毛泽东在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曾主持拟定租率、田赋、地主来源、主佃关系、抗租减租、农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民歌等36个项目引导学生作调查，并要求学生把家乡的情况，按调查项目填写。9月1日，毛泽东为《农民问题丛刊》写序言时，深感研究农民问题的材料缺乏，希望在不久的时期内，“从各地的实际工作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国的调查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167页）。因此，国共合作后，毛泽东十分重视农村调查，这些关于农村调查的具体实践、问题选择与行动倡导，为农民运动调查奠定了基础。

1927年1—2月，毛泽东历时32天，对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进行考察。每到一地，“召集有

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2月16日，毛泽东就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写报告给中共中央。报告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党对农运的政策，应注意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的“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的议论；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179页）。这些基本观点，构成了《报告》的主要内容。

正是基于实地调查，毛泽东在《报告》中，对湖南农民运动有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澄清了关于农民运动的不实之词。针对农民运动“糟得很”，农会的举动“太过分”、有一点“乱来”，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等说法，毛泽东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在他看来，农民运动“好得很”，成就了“奇勋”；农会的所谓“过分”举动具有“革命的意义”；农民是“革命先锋”。国民党右派关于农民运动的种种说法是道听途说，缺乏调查基础；而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结论是基于实地调查，因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在舆论混杂、是非难辨的情况下，有利于赢得话语优势和话语主动权。美国学者布兰特利·沃马克在论及《报告》时说：“毛泽东是以农民运动专家的资格在说话”，“长期的实地调查赋予了他在论述农村问题的权威性。”（《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湖南农民运动的亲身经历，使他说这番话有足够的底气和自信。

当前，中国农村处于变革之中，各级领导干部制定农村政策，推动农村改革发展，仍需要对农村进行调查；在对农村进行调查时，要开调查会，广泛听取农民的意见，进行实地考察，

不能走马观花，搞形式主义。只有经过充分的农村调查，才能制定适应当代中国农村状况的改革发展政策。没有农村调查，就没有资格在农村问题上发言。

毛泽东在农村环境下成长，尊重农民、敬畏农民，对农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在寻找中国革命力量时，如果说1924年前对工人关注较多的话，那么，1925年后则将目光主要聚焦于农民。《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通过对各阶级的革命态度及形成原因的透彻分析，认识到中国农村所蕴藏的革命力量。

1926年1月，毛泽东发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将中国农村分为八个阶级和阶层，即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对各阶级的革命态度进行具体分析。在此基础上，强调将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工人组织起来，成为中国革命力量。6月，毛泽东为第六届农讲所学生讲授农民问题时，从人口、生产、革命力量、战争关系、革命目的五个方面，阐明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得出“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的结论。9月，毛泽东为《农民问题丛刊》写序言时说得更直接：“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163页、第166页）。这些认识，揭示了农民革命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为毛泽东在《报告》中定位农民及农民革命的作用奠定了基础。

在《报告》中，毛泽东依据自己的观察，断言“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这是对农民运动革命性、正义性的总体肯定，彰显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在《报告》中，毛泽东对农民的革命态度进行了具体分析，将农民分为富农、中农、贫农三种。在他看来，富农的态度是消极的，中农的态度是“游移”的，贫农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

锋”，“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页、第20页）。农民的力量，来自农民的组织、农民的武装、农民的权力，来自针对农民的政治动员、文化教育。农民的力量，主要体现在推翻农村社会的封建统治，建构新的社会基础、社会秩序。经过这次农民运动调查，毛泽东认定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选择提供了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在国民中所占的比例逐渐缩小，但农民的绝对数量仍不容忽视。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新农村建设依然需要依靠农民力量；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需要农民的智慧 and 探索；农民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促进了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各级党和政府必须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满足农民基本利益诉求。

毛泽东不仅重视农村革命，也非常关注农村建设和发展。1926年6月，他为第六届农讲所学生讲授农村教育问题时指出：“农村教育是现在社会很大的问题”，对当时农村盛行的封建教育表示了极大忧虑。8月14日，毛泽东以第六届农讲所所长的身份参加中华农学会第九届年会开幕大会。他在讲话中指出：“农民是农业的根本，也就是中国的根本！”（《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165页）他鼓励与会代表到民间去，直接指导农民，从根本上救治中国农业。

在《报告》中，毛泽东所关注的14件大事，既是农民革命的内容，也是农村建设的重点。如通过农会将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民武装，建设廉洁政府，破除迷信与神权，普及政治宣传，严禁牌、赌、鸦片，办农民学校，建立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修道路、修塘坝，实际上已涉及农村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毛泽东期待通过农民革命改造农村权力框架，实现农村制度变革，改良农村社会风气，提升农民文化素养，促进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建设取得了明显进展，农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也应当看到，城乡之间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差距依然存在，有些传统观念制约了农村发展，部分农村尚未走出贫困状态。如何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农村成为现实；如何促进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同步推进，在完善村民自治、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协调推进农村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如何在谋求农村发展的同时，通过制度创新，把农民组织起来，走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道路，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作者：陈金龙，单位：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927年下半年起，随着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北伐大革命的胜利进军，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贪官污吏和旧恶势力等各种封建宗法思想和封建统治制度，引发了深刻的农村社会大革命。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遭到国民党右派和封建地主豪绅的诋毁和破坏，也遭到党内右倾错误领导的怀疑和责难。

为了回击和驳斥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回到当时农民运动发展最为迅猛的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在32天里，毛泽东步行700多公里，实地考察了湘乡、湘潭、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情况。在乡下和县城，毛泽东广泛地接触和访问广大群众，召集农民和农民运动干部，召开各种类型的调查会，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2月5日毛泽东结束考察回到长沙后，在湖南区委几次作关于农民问题的报告。2月12日，毛泽东回到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驻地武昌，在武昌都府堤41号住所的卧室内，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重要的马列主义文献。从3月5日起，这篇报告先后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报、汉口《民国日报》、《湖南民报》等连载。当时主管中共中央宣传工作的瞿秋白非常重视这个报告，他于3月间在中共中央机

关刊物《向导》周刊发表了这篇文章的前两章。4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单行本出版发行。瞿秋白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杂志俄文版和英文版的《共产国际》先后以《湖南的农民运动（报告）》为题，转载了《向导》刊载的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全会扩大会上谈到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并称赞这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热烈赞颂大革命中的农民群众推翻乡村封建统治势力的革命行动和历史功绩，尖锐地批评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各种谬论，阐明农民斗争同中国革命成败的密切关系。他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他明确地提出，一切革命的党派和同志，都应当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前进，而不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更不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他强调，必须依靠广大贫农作“革命先锋”，团结中农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力量，把农民组织起来，从政治上打击地主，摧毁封建武装，重组农村政权。这是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之后，进一步解决了无产阶级正确对待农民这个最主要同盟军的重大原则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工农联

盟的理论，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纲领性文献。

这篇报告发表后，很快就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它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为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推动了农村大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在湖南，广大农民群众从掌管乡政权发展为要求掌管县政权，从减租减息发展为要求没收地主土地和公平分配土地，农民群众夺取地主武装、扩大农民武装的斗争也进一步开展起来。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在随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的极为险恶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才能够领导工农群众，从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中成功地转向土地革命战争。

湖南农民考察报告读后感篇五

近段时间读了毛泽东在一九二七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感受颇深。作为一名社工专业的同学，我不仅从普通群众视角解读了这篇报告，更是利用专业知识对这篇报告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解读。

首先，就报告本身而言，我觉得毛主席的这份报告可以让我们对如何写报告有做一个范本，如何写一份调查报告呢？第一，要确定调研的主题；第二，要确定采取什么调研方法；第三，知道分析问题的方法；第四，懂得撰写报告。毛主席在《湖南运动考察报告》中采用的是实地调查的调研方法，他整整话花了三十二天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提取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的报告，利用观点对比、案例分析、逻辑归纳等方法撰写了这份报告，可见毛主席为了这份报告投入的心血，足见这份报告的含金量以及其对农民的重要性的认识。作为社工专业的同学，我们学过《社会调查理论与方法》，可以利用书本知识与此报告相结合来总结出一些自己的看法，我相信这对我们以后的报

告撰写会有很大的帮助。

在这份报告中，可以发现在革命时期之前有一个组织时期，我个人认为这个时期是很关键的。在这个时期，需要有人去领导，有人去组织，有人去支持，有人去参加，这样才能更广泛地发动群众。这自然让我想到了在《社区工作》课上老师讲的关于社区工作的相关知识。当作为社工去做社区工作时，若想去协调好社区的一些问题，想让一个社区的某些长时间存在的问题得到解决，并非易事。在问题得以解决之前，我们需要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去了解社区，进而寻找并鼓舞一些社区领袖来组织社区居民，从而进行群众性的宣传，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而我认为报告中组织时期的领袖人物正是那些能直接领导的农会会员，在他们的组织下，农会规模得以壮大，越来越多的农民自觉加入农会，从而形成更为庞大的社会群体，正是因为规模的壮大，才使农村革命一步步的进行下去，直到最后革命的胜利。当然，报告中的组织时期的各项运动并不完全与社区工作时的一些工作相同。

接着，我就报告内容有了自己的一些解读以及看法。

在毛主席撰写的报告中，把几个月来农民的行动分类总计得出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总共做的十四大事件：第一件是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第二件是政治上打击地主；第三件是经济上打击地主；第四件是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打倒都团；第五件是推翻地主武装；第六件是推翻县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第七件是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第八件是普及政治宣传；第九件是农民诸禁；第十件是清匪；第十一件是废苛捐；第十二件是文化运动；第十三件是合作社运动；第十四件是修道路，修塘坝。从这十四件大事中，可以看出此次运动中主要是农民与地主、土豪乡绅之间的斗争以及对农民权力的争取，在政治上与地主权力斗争，采用清算、罚款、捐款、小质问等方法；在经济上宣传减租、减押、减息等方法；推翻都团、县衙、祠堂、土匪等团体，建立农民武装；普及政治宣传和文

化宣传。这些做法可谓是对敌人全方位，多角度的打击。从一系列的运动中体现出农民一步步地将革命推向有利局面的过程，在我看来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条理的。我对十四大事件中的‘第七件事中推翻丈夫的男权以及第九件事中对农民的诸禁等做法是持积极看法的，在我看来这是革命带来的社会进步的现象。读了报告，我可以深深地感受到农民在长时间的压迫下所积压的愤怒、不满和他们极其想要革命的决心。也可以看出毛主席对农民现状的深刻了解、对农民的支持。

报告中毛主席是一边倒地向着农民，对土豪乡绅、地主等人几乎是全盘否定。而我确不完全赞同农民的一些行为。在“所谓过分问题”这部分里面，讲到农会到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也可以去玷污他们的小姐、少奶奶，就这件事我觉得农会的做法和强盗、土匪没什么两样。其中还有讲到革命是暴动的，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为，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我觉得农民想要翻身摆脱压迫的心情我十分理解，但是农会连最起码的法理都没有，它真的可以很好的管理社会事务吗？虽然从现在看农村革命是胜利的，但在当时那段时期，社会问题也是很多的。在“所谓的痞子运动”这部分里，里面有一句“他们举起他们粗黑的手，加在绅士的头上了。”看着这句话，我的内心是划过一丝恐惧的，是替那些土豪、地主、乡绅感到恐惧。说到这，我想联系我太公那时候的情况发表我的看法，听爸爸说，爷爷的爸爸也就是我的太公以前是地主，他虽然有钱，但他心地很好，他领养了好多个孩子，对每个人都同等对待。奶奶总是说“你太公以前是凭自己的努力才变成地主的，但是后来革命，地主家里出来都地位很低的，人家听说你是地主家里的人，都看不起你，我当时看上你爷爷。”，我并不是很了解太公那时候的情况，但我知道太公是一个好人，但因为他是地主而被人看不起，我想在农村革命时期肯定有许多凭自己努力达到地主、土豪地位的人，而他们却因为处在农会的对立面而遭到打击，被视为“坏人”，对于农会对这些人的一些打击行为，我是不赞同的。

以上是我个人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一些见解。